

一、民国思想概述

民国思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之一。本书以民国时期哲学、文化、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基本线索 概述民国思想史的大致趋势及一般面貌。

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但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结束清末以来持续进行的東西文化、新旧思想的争论 相反 却使这种争论更为普遍化、深入化了。民国初年 伴随政治上的动荡局势和帝制复辟的酝酿 思想界一度出现尊孔复古逆流。孔教会的成立、康有为“孔教救国”的宣传、舆论界“昌明国粹”的呼吁、学术界注重传统风气的抬头 凡此种种，都与民国精神不相吻合。与此同时 民国局面的不如人意 促进了另一批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引发了进一步宣传民主、科学，猛烈批判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是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从事他们的启蒙工作的。他们宣传的民主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精神两方面的内容 而尤重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他们宣传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 而尤重科学的原则与方法。他们对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比前人来得更猛烈、深入，从而使民主、科学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使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人生哲学等观念受到沉重的冲击 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大量传

入打开了局面；同时提出了传统思想若要继续生存，必须改革自身这一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应当面对的重要问题。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改革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众多新刊物的出现为新思潮流行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前期《新青年》杂志即已开始的输入西方文化思想的工作，到民国八年（1919年）以后得到迅速扩展。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派别、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观念纷纷被介绍到国内。其中杜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罗素哲学、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柏格森与杜里舒的哲学尤为引人注目。

杜威哲学以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实验性和实用性为特征，具有破除专制迷信，促进思想解放的价值与意义，比较适合“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反思传统、确立科学思想原则的需要，对时人有较强的吸引力。胡适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系统介绍实验主义的历史发展、主要内容及杜威思想的精髓，加上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年）间杜威本人在华两年多的讲学，使实验主义哲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超过其它任何派别。

马克思主义是在民国八年以后输入和传播的，并很快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两个范围内产生效应。作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它在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及青年学生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则在哲学、文化、史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罗素有着渊博的学识和闻名国际的声望，他在华9个月讲学所得到的舆论推崇，不亚于杜威。但由于他的理论哲学偏于高深，又加上他的政治思想摇摆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因此限制了他的哲学在中国产生影响的范围。

此外 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为民国史上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等提供了理论依据。

如所周知 上述各派思想观念不同程度地为不同立场、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所接受 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诸派并立 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由于各派别在一些众所关心的问题上的矛盾 从而引发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等一系列论争。

在西方思想大量传入国内的同时，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弃取 西方文化的采择 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等问题 不同的派别之间亦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从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对垒 到民国八、九年间有关“调和”问题的讨论 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 到围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展开的争论 从学衡派、甲寅派的相继出现 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阐发；一直到 20 年代中期，民国思想界俨然形成了以梁漱溟、梁启超、梅光迪、章士钊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 以胡适、常乃惠、张东荪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中共党人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之间的对立。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民国十年 1921 年 前后 史学界继本世纪初梁启超宣传“新史学”之后出现了波及面宽阔的新史学思潮。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西方逐渐活跃起来的新史学理论系统的介绍和唯物史观在较广范围的传播，构成了这次新史学思潮的主流，并由此推动了史学思想与观念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说 民国初期到 20 年代末期中国思想界的变动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思想的引入、介绍、疏解和一般地运用方面 那么 由

30 年代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便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类新体系的形成，大体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以西方思想为主体，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或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其加以再创造。如张东荪的哲学揉和康德、柏格森、詹姆斯等人的理论，以注重认识为特征，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多元认识论和泛架构主义的本体论；叶青的哲学以辩证法立言，提出了哲学消灭论、科学与哲学统一论、物质与观念统一论和思维科学创立论；艾思奇、李达、毛泽东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认识论与辩证法作了系统归纳和阐发。二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借鉴西方科学方法，对其加以更新改造，如冯友兰借鉴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中国传统的理、气等概念，对宇宙本体作出新的解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理学”体系贺麟借鉴黑格尔哲学就“心”的概念、知行关系等问题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作了新的阐释；熊十力运用中国传统儒学、佛学概念解释西方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体用不二”、“翕辟”成变、心性与本体合一等学说；蒋介石、陈立夫鉴取西方法西斯主义与生命哲学观念，对传统儒家的人生哲学和王阳明“致良知”等学说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以“仁”为目标、“诚”为动力、“忠”、“孝”等为主要内容的“力行哲学”和“唯生论”哲学。

在文化思想方面，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陈序经的较为系统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与“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主张。在史学方面，民国二十年前后开始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推动了唯物史观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进一步运用。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果和吕振羽、范文澜、邓拓、侯外庐等人对历史理论与历史过程进行探讨的成果为标志，

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而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则代表了中国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成熟。

纵观民国 38 年间的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出其始终贯穿着东西文化、新旧思想的抉择取舍问题。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显著特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冲突，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民国时代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明显的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占上风的趋向和传统思想改造更新的趋向。关于前者，民国八年以后新思潮广为流行，与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反映出的趋新时尚；民国十二年（1923 年）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中科学派占据压倒优势的状况；三十年代在西方思想观念基础上展开的哲学问题论争等可为其证明。关于后者，民国八年西化派胡适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主张；同期梁启超倡导以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医治传统学术的弊病；梁漱溟有关吸取西方文化精神，“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之说，及至 30 年代冯友兰等对传统哲学所作的改造等可为其证明。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新”，经改造而更新的传统思想亦可说成为“新”。从这个角度，民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更新过程。

如果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宋儒发明理学、重光道统，中国近二千年的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学经典的释扬为其主干的话，那么，民国以来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猛烈冲击，则开创了 30 余年的思想多元化格局。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民国史上的思想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各不同学派的独立发展，而且尤其表现在不同派别、不同观点在众多问题上的争论。民初有复古尊孔与

宣传新文化反孔之争，民国八年前后有东西文化之争，20年代有中国古史讨论、30年代有哲学问题论战和围绕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理论展开的论争，连同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的多次论争、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争等等，可以说，民国思想史是一部充满论争的历史。

思想多元化及各派之间的频繁论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代思想发展与政治局势和政治斗争关系密切的事实。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特点。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临被列强宰割瓜分的危局，民国时期，这种形势并未根本解除。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和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更相继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事。应该说，正是对挽救国家、复兴民族道路的追求，加快了民国思想更新的进程。同时，中国人在追求真理时知识的觉醒和在救亡斗争中情感的充溢一起融进他们的思想之中。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始终没有形成政治统一的局面，原有的和继起的政治派别为实现各自的理想、主张，在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亦十分注重思想上的斗争，这便使思想界的很多论争明显掺入政治色彩。到30年代以后，这种色彩愈来愈浓，以致立于政派之外的思想派别也多被卷入带有政治气味的思想论争。这种现象对民国及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民国初年思想的发展

（一）辛亥革命后政局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揭开了民国历史的第一页。由于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这个民主共和国出现后不久，就名存实亡了。随后出现了以袁世凯和张勋为代表的帝制复辟和反对复辟的斗争。这种政治状况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辛亥革命与思想界的洗礼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经临时参议院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开始了他从独裁统治走向复辟帝制的一系列活动。伴随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反动倒退，思想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思想潮流。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从思想上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帝王的专制思想，使民主共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历史的国家，根深蒂固的王权

思想、封建的纲常礼教等等，并不是一次政治上的革命就能完全肃清的。一遇时机，它仍会沉渣泛起。辛亥革命的失败，民国政权的旁落，就给封建思想的复起提供了一个机会。民国元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成立了孔教会。孔教会成立的目的，陈焕章说得很明白：“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①可见孔教会的成立主要是对辛亥革命所造成的结果不满。

同年 12 月，孔教会的一些发起人张勋、麦孟华、陈焕章等上书袁世凯、教育部和内务部，请求准予立案施行。教育部很快就批示：“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次年一月，内务部也批复“准予立案”。这表明民间的守旧心理和政府的统治需要在尊孔方面达成了一致。

孔教会成立后，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宣扬孔教，召开讲习会，宣讲经文，宣扬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并在大成节和“丁祭”日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孔教会是当时全国性的孔教组织，它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中设有许多支会和分会。

在孔教会的影响下，民国二年（1913 年）以后，国内一些报刊杂志相率表现出了尊崇孔子的思想倾向。它们把辛亥革命后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归咎于不尊孔教，要求定孔学为一尊。民国初年的《时报》声称：“吾国今日大势之机陞，未有危于废弃孔教者

^①《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1 卷 1 号。

也。’^①认为：“孔教之于吾国 不特为数千年教育之宗 而政治、道德、人心、习俗 实无一不于孔教是赖 非定为国教 使之如日中天 则道德之败坏 人心之牾亡 政治之堕落 风俗之偷靡 将有不堪设想者。”^② 民国四年（1915年）成都部分学人创办的《世界观》杂志也认为孔学即为孔教 应立为国教。

袁世凯在政治上进行帝制活动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他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不久 就发布尊孔令 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 必须举行祀孔典礼“以表尊崇”。他还派人参加孔教会举行的祀孔大会，表示支持。随后 袁世凯相继作出祀孔礼仪应与敬天一律的特别指示 制定祀孔的具体办法 批准了在中小学修身或国文课程中恢复读经讲经的旧制度 并且 明令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民国三年（1914年）九月二十八日 袁世凯亲自率领文武诸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 举行大型的祀孔活动。由此 尊孔读经活动愈演愈烈。

袁世凯如此大力鼓吹、宣扬孔孟之道 无非是想利用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来维系人心 控制和阻止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深入传播 以达到其在政治上专制独裁。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袁世凯的‘祭天祀孔 议及冕旒 司马之心 路人皆见。’^③ 章太炎也发表言论 指责“以孔教为国教 其名似顺 其心乃别有主张” 并痛斥倡立孔教会神化孔子的举动 明确表示反对立孔教为国教。革命派认识到中国所谓忠孝节义等礼教 无一不与近世国家文化相违背 中国的出路不

① 《尊孔女校开幕感言》，《时报》，1913年3月19日。

② 《孔教问题》，《时报》，1913年12月22日。

③ 《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

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孔教而在科学。尽管这些驳斥尊孔复古的言论在当时显得很微弱，但毕竟揭露了尊孔教与专制复辟之间的联系，对民初这股复古逆流给予了一定的打击。

2. 康有为的“孔教救国”论

孔教会成立后，康有为被推为会长。他积极参与宣传孔教的活动是同他的孔教救国思想相关的。

首先，康有为主张推崇孔教，符合他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他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要实现民族富强，挽救危亡局面，没有一个“乾纲独断”的君主实行近代立宪政治是不行的。而政治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无疑应由传统道德观念加以维系。

其次，尊孔符合他“托古改制”的思想体系。他的一整套救国改良设想、措施，都是建立在对孔子学说的重新阐发之上的。抛弃孔子无异于抽去了他整个思想的精髓。

再次，提倡孔教与他对民初政局混乱、世风浇漓的忧虑相关。他认为民国成立虽一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但“纪纲尽废，法典皆无”；“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业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如此“惨状弥布”，几近“栋折榱坏”，他实在“不能忍而不言”。^①于是民国成立不久，他即在《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上撰文，大声疾呼：“以孔教救国！”

康有为反复申言，在欧美发达之国，未有不立宗教，不重道德者。各国宗教均有化民成俗，扬善抑恶之功。而中国“数千年

^①《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

奉孔子之道以为国教，守信尚义，孝弟爱敬，礼俗浑厚，廉耻相尚。”孔子之道“博大如天，兼备四时”，“尊天而兼敬祖，故仁孝并重”；“敷教在宽，故能兼容他教而无碍”；“兼言政治，却不碍信教自由”；^①“实较它教更有优势。康有为宣称：“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谗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

康有为如此鼓吹孔子之道，还因为他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旧教伦理太深，而不可骤弃”。他认为中国之旧法，“实中国数千年政俗所流传”；“经累朝之因革损益，去弊除患，仅乃得之”；“虽有专制之失，而立一统之制，其所得亦甚多也”。^②“中国立国数千年，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③因此，在他眼里，只有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典章法律、孔子之道“合于国情，宜于民俗”；“欲治人心，定风俗”应大力宣传孔子之道，“遍立孔教会”。^④

平心而论，康有为对民初政局的忧虑不无理由，他的孔教救国之论也确实出于忧国忧民的考虑。但是，他在民主共和思想影响日渐深入的时候，去教人们转回头来遵守封建专制的伦理道德，难免有拉倒车之嫌。从客观的历史事实看，他尊崇孔教的主张无论出于何种愿望，也只能助长政治上的倒退和专制复辟

《中华救国论》。
《孔教会序一》，《康有为政论集》。
《中华救国论》同上。
《孔教会序一》。

③ 《中华救国论》。

的形成。因此，他的尊孔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革命者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无情批判。

3. 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的倾向

辛亥革命后，民国名存实亡的局面，也导致了部分人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失望。从而在思想界引起了对以孔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视。

在尊孔问题上，虽有象康有为等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学者主张从学理上研究孔子学说，以保持中国传统。辛亥革命后的一些报刊大多明确表示发扬中国国粹的宗旨。民国元年创刊的《中国学报》就主张“保存国粹”^①，倡导国学。该刊第七期发表了李天怀的《尊孔说》表示要尊孔，但反对将儒学尊为国教。认为不尊孔和把孔子捧得过高都是不对的。为了给尊孔找到理由，一些主张尊孔者把孔子学说与民国以来的一些新观念附会起来。如有人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包含有世界主义、平等主义、博爱主义、非战主义，微言大意，散见于公羊、谷梁二家之师说。”^①也有人把孔子学说与“共和”加以联系，认为“孔子之政说，绝对的共和政说也。”^②

与《中国学报》差不多同时创刊的《学艺杂志》也有同样提倡国粹的主张。他们认为“在欧西文明大量输入之时，求欧化而兼重国粹可也，弃国粹而偏重欧化不可也。数典而忘祖，舍田而耘，立见其败。”^③ 苕碧在《广司马谈六家要指》一文中提出：“儒家之学即教育学与政治学也；道家之学即哲学也；阴阳家之学即

① 江瀚：《孔学发微》，《中国学报》第 1 期。

② 薛正清：《孔子共和学说》，同上。

③ 慕韩：《文学与国家关系》，《学艺杂志》第 1 期。

步算学也 法家之学即法律学 名家之学即论理学 墨家之学即社会学及自然科学 纵横家之学即交涉之学 杂家之学即各种应用学 农家之学即种植学 小说家之学即喜剧悲剧之学也。彼西士名人旦夕讲求夸为绝学者，何一非吾中国二千年前所阐发无遗者耶”；西学之原 始实皆窃吾周秦诸子之绪论发挥而光大之”。因而他认为“学无中外 贵在适宜 如周秦诸子之学皆足与西学相印证，吾能博采兼收互为发明，则成一完全之学术不难矣。”^①

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国学杂志》。编者慨叹“开关以来 输入新学不少”，“吾国先圣昔贤之留遗 因是而泯没者 岂少哉！”^② 因此 创办《国学杂志》 昌明国学 以学习古圣贤救国救天下之心 救国救天下之学。他们还认为经学是中国国粹之源 主张尊孔读经。该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拟各校配置读经讲经议》 提出各学校应配置读经讲经课 每天一课时。初小读《孝经》 高小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 中学读《礼记》、《书经》 大学设经科 兼学群经。

一些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也活跃起来。如叶德辉于民国四年（1915年）编成的《经学通诂》就是他在湖南尊孔读经活动中讲授经学的讲义。该书提出了读经要做到“六征”、“四知”、“五通”、“十戒”。它称得上是一部经学研究著作 也是一部宣扬孔孟之道的教科书。

注重传统学术的思想倾向，在早期改良主义者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譬如较早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 这时却认为民主共和制不适于民众觉悟还不甚高的中国。他本人也从

苕碧：《广司马谈六家要指》 同上。
倪中铎：《国学杂志序》，《国学杂志》第1期。

介绍宣传西方学说 转向研究中国传统学说。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 窃尝究观哲理 以为耐久无弊 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 惟须改用新式机器 发掘淘炼而已。”^①显然，严复晚年认为孔子之书是值得研究的。为此，他提出在大学里设立专科研究探讨中国文化。

在史学领域中，《清史稿》的编撰反映了传统史学思想的活跃。作为传统正史的历代各朝的史书，在本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曾被认作封建王朝一家一姓的史书，和统治阶级的“相斫书”一起而受到了抨击和批判。民国之后，在尊孔读经这一思想氛围中，传统的史观、史法和记载形式又有了市场。民国三年（1914年）北京政府国务院得到袁世凯的批准，设立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的清史馆，组织了百余名史家和前清遗老如缪荃荪、柯劭忞、张尔田、吴廷燮、王树枏等 经过一番准备后，开始依易代修史之惯例编撰清史。

在清史采用何种体例问题上，梁启超提出要将其编修成偏重新史的体裁，以反映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但大部分人员以“清史为结束旧史之时，不妨依据旧史”为由，决定采用旧史体例 仿照《明史》稍有变通。全书编写历经 14 年之久 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大致完稿。无可否认 这部长达 500 余卷的清史巨编 自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然而 围绕该书编撰而起的争论 不能不说是民国初年新旧思想矛盾斗争的反映。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的复古倒退，引起人们的反思。一些目光敏锐、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尚不足以救治中国，原因在于多数国人思想守旧，迷信盲从，无独立性，无自觉心，“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人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与封建政治、奴隶政治没有两样。^①因此，若想保住共和制度、实现真正民主，应该首先培养国民的自觉自动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宣传现代文明意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观念。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以此为主要阵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旨在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宣传

陈独秀（1879—1942年），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自幼聪明、顽皮，感情易冲动，不怕鬼神，不畏强暴，又同情弱者。12岁始读八股，即生鄙夷之念。青年时值戊戌变法，阅《时务报》，深为所感。又悉闻八国联军入侵，目睹沙俄士兵在东北烧杀淫掠，遂产生爱国救国之志。自22岁赴日留学开始，十几年间他用心最多的是两件事：参与组织革命团体，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和编撰报刊，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宣传爱国革命。民国三年（1914年），他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时，结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

识了高一涵、李大钊、易白沙、张东荪等同年 11 月在《甲寅》1 卷 4 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冒不爱国之恶名，恺切陈述爱国真义和自觉心之重要，被誉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正是这样的执著追求民主，勇猛无畏，使他成为在民国后政治、思想最黑暗的年代里奋起反击专制复古逆流、向千百年来封建文化发起挑战的急先锋。而民主与科学则是他用以启迪民智、反击传统的主要武器，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最为响亮的口号。

所谓民主，原本包括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两方面内容。但在产生现代民主观念与制度的西方国家，就价值观方面来说，有的重平等，有的重自由。就政治制度说，有的实行共和，有的实行立宪。这种情况对于引进民主观念的中国人不能不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戊戌前后严复、梁启超等人从民族危机、国民智力程度出发，强调发挥个人能量的自由与国家统一富强的一致性，因而在思想上从事启蒙，在政治上则主张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戊戌至辛亥期间，邹容、孙中山宣传自由平等是为政治革命，建立共和国家造舆论。他们大多未从改造整个民族文化角度考虑民主的意义。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是在吸收前人对民主的认识，解决新时代提出的课题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宣传的，他们不仅认识到具有现代民主观念的个性人格与现代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关系，也认识到树立现代民主观念与打破整个封建文化权威影响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他们注重的是民主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观念的统一；强调树立现代意识和批判传统观念的统一。

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民主价值观念，首先是个人独立自主观念。陈独秀指出，近世以来欧洲历史被称为“解放历史”，“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那么，怎样才算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呢？陈独秀等人认为：他应该认识到

个人的生存价值：“人间百行 皆以自我为中心 此而丧失 他何足言”他应该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青年立世 要当纵横一世，独立不羁”要作“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作那“最孤立的人”；他应该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 敢于怀疑 破除迷信 凡事“求诸自心之真知灼见”勿盲从先贤圣人 他应该勇于进取 对社会“担干系 负责任”；应战胜恶社会 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他应该有自治能力“以勤力战惰性”；以大己战小己”；以人道战天行”。所有这些从不同侧面体现出“我有手足 自谋温饱 我有口舌 自陈好恶 我有心思 自崇所信 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 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的自主自立人格。这正是陈独秀等人理想中新型青年暨共和国国民应具备的人格。

《新青年》创刊伊始即申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这个“时政”大抵是指现实中的政治问题 而不是指民主政治理想或观念。事实上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大力宣传独立自主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要在 中国保住共和 实现“真民主”。为此 他们一方面反复论证“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之间的关系，强调民主共和 果能实现与否 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与此同时 他们也十分注意民主政治观念的宣传。这种宣传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针对政治上出现的专制复辟活动 指出共和民主为世界政治进化之潮流，中国政治“万无超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第二 批评“贤人政治”斥其“与专制同其界说”；宣传由人民“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自进而建设政府 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 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的“自由的 自治的国民政治”思想。第三 辩明共和国家言论自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政府体